

政府主導與經濟發展： 金大中時期南韓大企業改革之分析

Government Le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uth Korea Chaebol Reformation during Kim Dae Jung

蔡增家 *Tsai, Zheng-Jia*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過去學界對於解釋南韓在 1997 年之所以會爆發金融風暴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有的學者認為是南韓大企業的收益減少所導致的連鎖效應，也有學者認為是南韓銀行體系的不良債權過高，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是南韓親信主義下所產生的政商勾結，但是這些因素其實都是與南韓大企業的發展政策息息相關，本文嘗試將從南韓政府與大企業互動關係的角度，來去分析 1998 年之後金大中對大企業的結構改革。本文主要論點認為：南韓自 2000 年之後經濟發展的成功，主要歸功於金大中的企業改革，這是一項由政府所主導的企業結構改革，這項改革不但改變過去南韓過度集中在大企業的產業結構，也

改變大企業內部濃厚的家族持股色彩，同時也改變大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利益輸送關係。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S. Korea's economy is the most brilliant achievement among the Asian countries. But before seven years, S. Korea is suffered financial crisis and asked for aid to IMF.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why is Kim Dae Jung's reform policy success and Kim Young Sam fail ? The article argue that since Kim Dajung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in February 1998. He proposals two policy agendas: on the one hand, he draws aid fr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to reform South Korea economic 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he went beyond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established a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 to carry out political reform. concludes that the primary reason of Kim's success is as follow : firstly, he does not go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channels. Secondly, he is reestablishing the new monitoring system. As a result, Kim's reformation fundamentally reshapes South Korea's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by Park Chung-hee. We are pretty sure that Kim's reformation has achieves significantly.

關鍵詞：結構改革、親信主義、南韓、金大中

Keywords: Structural Reform, Crony Capitalism, S. Korea, Kim Dae-Jung

壹、前言

從 2000 年之後，南韓經濟的快速發展便成為國際間矚目的焦點，南韓經濟的成長不但顯示在對外的貿易金額上，也顯現在企業的急遽擴張上，同時也表現在國民年平均所得上，根據統計從 2004 年開始，南韓的國民平均所得已經到達了 14108 美元，超過我國的 14032 美元，¹同樣在 2004 年，我國對南韓的貿易逆差急遽上升到 62.74 億美元，而在 1989 年台灣與南韓的貿易逆差也只有 1.09 億美元，南韓已經成為我國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進口國家，同時在全球前五百大企業當中，南韓企業就佔了 11 家，三星集團更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企業。²

但是別忘了，就在十年之前的 1998 年，當時南韓正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侵襲，國民平均所得從 1996 年的 11000 美元跌到 1998 年只剩下 7500 美元，在當年南韓的國民年平均所得只有台灣的六成，而全國的總體失業率也超過 7%，南韓的第二大企業--大宇集團更是宣告倒閉，接受債權銀行的拆解與拍賣，南韓政府在無計可施的之下，只有宣布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援助，同時接受國際貨幣基金嚴苛的纾困條款，而南韓人民也將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援助視為對南韓的經濟殖民，南韓經濟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³

過去學界解釋南韓在 1997 年之所以會爆發金融風暴有許多不同的詮釋，有的學者認為是南韓大企業的海外收益減少所導致的連鎖倒閉效應，也有學者

¹ 有關南韓的國民平均所得是否已經超越我國，各方有了不同的說法，根據聯合國舊版會計帳計算法，2004 年南韓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為 14100 美元，首度超越我國的 13500 美元，但是根據聯合國新版會計帳計算法，2004 年南韓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為 14162 美元，而我國為 14199 美元，仍然領先南韓 37 美元，另外根據經濟學人智庫預測，2007 年南韓的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將到達 18450 美元，遠超過我國的 15970 美元。請參閱《中國時報》，2006 年 11 月 16 日，版 A3。。

² 李雪莉，〈韓國有夢，所以躍升〉，《天下雜誌》，2004 年 12 月 15 日，第 313 期，頁 132-133。

³ 〈亞洲金融風暴與南韓經濟發展〉，《國際經濟情勢週報》，1997 年 12 月 25 日，第 1216 期，頁 8。

認為是南韓銀行體系的不良債權過高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是南韓親信主義下的政商勾結所產生的政治弊端，⁴其實這些因素都是與南韓大企業的發展政策息息相關，南韓從 1970 年代全面發展經濟以來，便是政府為主導、大企業為產業主體的政經結構，在南韓政府的刻意保護政策下，重化工業的帶動下，以及大企業所形成的多元化產業，的確促成南韓在 1980 年代經濟的快速發展。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南韓政府以推動大企業發展的政策主導下，政府所掌控的銀行體系便以低廉的代價提供大企業鉅額的發展資金，在資金來源不虞匱乏的情況下，讓大企業進行許多無經濟效益的海外投資；其次由於大企業的發展需要龐大的資金，於是政府所控制的銀行體系便成為大企業資金的主要來源，在這種不計成本效益的政策考量下，讓南韓銀行體系累積了鉅額的不良債權；最後由於南韓政府對大企業量身定做的產業政策，以及過度的偏好性貸款，讓南韓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利益輸送關係越來越嚴重。由此可見，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侵襲南韓，其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於大企業的結構性因素，也就是南韓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政商關係。

1998 年金大中上台之後，在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下，積極對南韓的政治經濟體制作全面性的改革，其改革項目主要區分為銀行體系的改革、大企業的改革、政商關係的改革以及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這些改革項目當中，對南韓整個政經結構影響最大的便是大企業的改革，在金大中的改革號角下，大企業不但進行規模縮減計畫，也彼此進行產業的合併，同時也對企業進行產業轉型與升級，南韓在歷經 1998 年至 2000 年期間大企業的結構改革之後，不但改變

⁴ 有關學界對這三種不同的說法，請參閱高龍秀，《韓國の經濟システム：國際資本移動の擴大と構造改革の進展》（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0 年）；Larry Diamond and Doh Chull Shi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Korea*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al Press, 1999); David Kang,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Stephan Haggard, Wonhyuk Liom, and Eusung Kim, *Economic Crisis 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Korea: Reforming the Chaebo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過去南韓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政商關係，同時也再造南韓另一波經濟成長的高峰期。

因此，本文將以南韓大企業的結構改革為分析主體，來解構南韓自 2000 年以來經濟能夠快速成長的因素。本文主要區分成六個部分：首先是前言，介紹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與內容安排，第二部分則是理論的探討，主要在探討政府與企業之間不同形式的互動關係，第三部分則是分析 1997 年之前南韓大企業的發展歷程，第四部分則是探討 1997 年之後南韓政府對大企業結構改革的主要內容，第五部分則是分析大企業結構改革之後，南韓政府與大企業之間政商關係的轉變，最後則是依據以上的分析做簡單的結論。

貳、理論探討：政府與企業

過去發展國家論在探討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大多是從管制的角度來切入，也就是將政府管制企業的方式區分成政府主導與政府放任兩種類型，同時將企業的發展模式劃分成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兩種型態，這種分類方式固然可以讓我們知道國家在發展經濟時候會產生哪些不同的管制模式，但是卻沒有分析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政府在進行企業管制時是利用何種的管制工具。⁵因此，若要深入分析政府與企業，則必須要從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著手。

舉例來說，韓裔美國學者 David Kang 便將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動關係區

⁵ 有關研究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相關文獻，請參閱 John Zysman,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Leroy P. Jones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orean Ca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Kurzer Paulette, *Business and Banking: Polit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Stephan Haggard, Chung H. Lee, and Sylvia Maxfield,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Karl J. Field, *Enterprise and the State in Korea and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Stephan Haggard, Sylvia Maxfield, and Ben Ross Schneider, eds.,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分成四種不同的模式，在國家層面，他認為可以區分成結合與脆弱兩種不同形式，在企業層面，則是可以劃分成集中與分散兩種形式，假若國家力量是凝聚結合，而企業組織也是集中，則是兩者之間相互為人質保證的恐怖平衡情況(例如德國等統合主義型國家)，其次假若國家力量是凝聚結合，而企業組織卻是分散的，則此時國家便是具有絕對的控制能力(例如南韓等發展型國家)，第三假若國家力量是脆弱無力，而企業組織是集中的，這會轉變成一種由下到上，完全由企業主導的關係型態(例如美國等自由市場國家)，最後則是假若國家力量是脆弱無力的，而企業組織也是分散，則國家與企業之間會是處於一種放任自由的關係(例如中南美洲等資本主義國家)。⁶

另外美國學者 **Stephan Haggard** 對政府與企業的互動關係也做了相當深入的詮釋，他認為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可以分為「視企業為資本」(business as capital)、「視企業為部門」(business as sector)及「視企業為公司」(business as firm)等三種，前者認為由大企業所組成的企業聯盟，是擁有極大的影響力，並可以有效控制政府的行為，例如統合主義下各種不同產業所組成的企業聯盟對政府政策便有極大的影響力；第二項則認為其實在企業之間彼此所追求的利益並不相同(例如，以出口為主導及國內市場為主的企業，要求政府達到的經濟政策目標也大不相同)，所以政府對於企業的決策仍是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例如自由市場型態的國家利用貨幣政策來影響企業的發展方向；第三者認為企業規模的大小，與企業資金的來源(銀行機構或是資本市場)，才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相互影響的兩項重要變數，例如發展型國家利用對企業資金來源的管制來控制企業的發展方向。⁷

接下來本文便是要依據以上兩位學者對於政府與企業不同互動關係的詮釋再進一步深入分析，本文認為我們可以將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區分成內部與外部兩個層面，在外部方面主要是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關係，兩者之間包括

⁶ David Kang,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5.

⁷ Haggard, Maxfield, and Schneider, eds., *op. cit.* pp.39-48.

管制政策與經濟政策兩種方式，所謂管制政策是指政府控制大企業的方式，例如偏好性貸款及互惠性的同意，經濟政策則是指政府所實施的產業政策，例如重化工業政策及壟斷性產業；⁸在內部方面主要是大企業與內部關係企業之間的關係，兩者之間包括金融來源與內部持股兩種，所謂金融來源是指企業發展所需資金的來源，所謂內部持股是指企業內部關係企業之間的相互持股。因此在外層層次，政府利用控制企業資金來源及營造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來管制國內企業，在內部層次，企業利用彼此的相互擁有股權來形成一個相互監督的安全保障體制。⁹（請參見圖一）

在瞭解政府與企業的雙重管制方式之後，其次則是要分析企業的不同發展型態，根據南韓學者 Jwa Sung-Hee 的看法，他認為企業的發展會受到金融體系、經濟政策、政治體制與經營方式等四種變數的影響，¹⁰根據他的說法我們再仔細的解構：金融體系是指企業主要資金的來源，其可以分成銀行體系與資本市場兩種，假若企業資金是來自資本市場，由於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使得政府不易控制企業，假若企業資金來自於銀行體系，則由於資金來源的集中，使得政府比較容易控制企業。經濟政策是指政府對企業的管制能力，其可以分成政府主導與政府放任兩種，假若是政府主導型態，則是政府利用產業政策來控制企業的發展，假若是政府放任型態，則是政府不積極干預企業，企業可以自由發展有利於本身的產業。¹¹

接下來在政治體制方面，我們可以區分成威權體制與民主政治，假若是威權體制型態，則是國家法律及制度的制訂是由人爲所控制，政府容易與企業之

⁸ Stepha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8-12.

⁹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5.

¹⁰ Sung-Hee Jwa, *The Evolution of Large Corporations in Korea: A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of the Chaebol*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2), p.168.

¹¹ Masahiko Aoki, Hyung-Ki Kim, and Masahiro Okuno-Fujiwara, ed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16-21.

間有特殊的利益輸送關係，假若是民主政治型態，任何的行事規章都是依據法令行事，在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動關係上產生有效的監督體制，比較不容易產生弊端。最後經營方式方面，我們可以區分成經理人體制與家族企業兩種，經理人體制是指企業的經營權交由專業經理人治理，企業可以朝向正常化發展，但是企業股權也會比較分散，而家族企業則是企業的經營權由少數的家族來控制，這種容易讓企業股權集中，而讓企業的經營上容易產生弊端。¹²（請參見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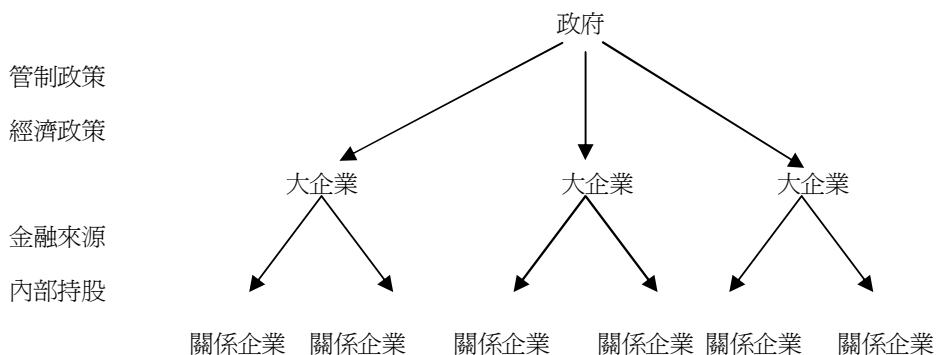
若將這套模式應用在南韓的例證，我們知道在 1970 年代南韓的政治體制正是軍人的威權統治，在朴正熙政府重化工業的政策下，許多企業便會依賴與軍人政府之間的特殊關係來獲得經營壟斷性的產業來快速擴展規模，這是南韓國大企業在 1980 年代快速擴張的主要原因，而在經濟政策方面，南韓則是屬於政府主導的重化工業政策，這項政策讓大企業輕易取得鉅額的資金，來獲得快速成長的機會，¹³在金融體系方面，南韓政府為了便於控制大企業，便利用銀行體系來作為企業主要資金的來源，以銀行優惠的低利率來幫助企業製造低價的國際競爭力，在經營方式方面，由於南韓軍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特殊關係，讓南韓國大企業掌握在特定的家族當中，而之後大企業更利用家族及關係企業之間的交叉持股來強化本身的經營權。¹⁴

在分析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理論性架構與關係之後，接下來則是要探討 1997 年之前南韓國大企業的發展過程。

¹² Tun-jen Cheng, "Political Regim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eds.,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1-60.

¹³ Alice Amsdem, *Asia's Next Giant: The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3.

¹⁴ Jung-en Woo, *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the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5.



圖一、政府與企業的雙重管制方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一、政府與企業的互動關係

			外部環境			
			政治體制		經濟政策	
			威權政體	民主政治	政府主導	政府放任
內部環境	金融體系	銀行體系	南韓		南韓	
		資本市場	南韓		南韓	
	經營方式	專業經營	南韓		南韓	
		家族企業	南韓		南韓	

◎深色字體為轉變後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1997 年之前南韓大企業的發展：從擴大到集中

1961 年南韓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張勉的文人政府，朴正熙軍人政府上台之後便開始對南韓實施威權統治，在歷經十年的整肅異己之後，朴正熙便於 1972 年展開推動重化工業政策來全面發展經濟，由於建構重化工業需要大量的資金，這不是一般中小企業所能負擔的，因此南韓政府便以扶植大企業為

主要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當時朴正熙的威權體制下，一家企業要能夠獲得政府資金的挹注來發展重化工業，便要依賴企業與執政當局之間的特殊關係，例如大宇集團金宇中父親與朴正熙間的師生關係，促成在朴正熙執政時期大宇集團的快速擴張，換句話說，南韓重化工業的推展是建構在：扶植與政府關係良好的企業，同時政府以控制銀行體系來挹注這些企業鉅額的資金來發展重化工業。¹⁵

南韓政府爲了要讓重化工業能夠順利推展，朴正熙便在青瓦台（總統府）下設立「重化工業推展委員會計畫辦公室」，由朴正熙自己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同時該辦公室底下也整合經濟企劃院、財政部、工商部及科技部等部會業務，全面以推動重化工業政策來發展經濟，另外南韓政府也依據企業的需求來擬定彈性的產業策略，而企業也瞭解唯有與政府密切進行合作，才能取得銀行體系提供充裕的資金來從事企業的擴張，因此企業對於政府的政策便具有相當高的配合度，其共同目的便是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南韓經濟也在重化工業的帶動下，從 1972 年開始快速成長，同時也順利讓南韓在 1980 年代擠身爲亞洲四小龍之一，但是在經濟成長的背後，南韓產業結構卻呈現畸形的發展，因爲大企業在南韓政府刻意的扶植下規模快速擴張，使得南韓總體經濟結構發展逐漸呈現集中及壟斷在少數大企業的現象。¹⁶

另外根據南韓學者 Jwa Sung-Hee 的研究，在朴正熙政府的重化工業時期，南韓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關係，其實可以區分成進入門檻、支持條件及退場機制等三個步驟及特性：在進入門檻方面，南韓政府對於企業並非一視同仁，它會選擇特定與軍人政府關係比較良好的企業，其次在支持條件方面，在選擇特定扶植企業之後，南韓政府會動員銀行體系給予該企業偏好性的貸款，讓企業在擴張過程沒有資金的壓力，最後在退場機制方面，在 1997 年亞洲金

¹⁵ Minho Kuk, "The Government Role in the Making of Chaebol i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 *Asian Perspective*, Vol.12, No.1, p.112.

¹⁶ Stephan Haggard et. al,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Adjustment in Korea, 1970-199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59-64.

融風暴發生之前，南韓政府並不希望國內發生大企業倒閉來影響整體經濟的發展，因此一旦發生企業財務危機，由政府所主導的企業重整委員會，便會給予大企業賦稅的減免或是公資金的挹注來拯救該企業，這便是重化工業政策時期，南韓大企業發展的三部曲。¹⁷

在這南韓大企業發展的三部曲當中，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互動關係便牽涉到三個層面，首先是政府的特許，雖然在重化工業期間，南韓政府鼓勵大企業發展鋼鐵與化學等產業，但是並不是每一家企業都能得到軍人政府的賞識，而是要依靠企業與當權者之間的關係，例如 1967 年才成立，但到了 1980 年就成為南韓第三大企業的大宇集團，便是依靠其創辦人金宇中的父親與朴正熙之間在軍校期間的師生關係，而得到南韓政府的全力扶植。¹⁸其次是政府於銀行的關係，大企業的發展必須要有充裕的資金來源，而南韓政府便以控制的銀行體系，對於特定的大企業與產業給予低利率的貸款，例如在 1975 年南韓銀行的商業支票利率是 24.6%，但是對於借貸給發展重化工業的企業生產設備的利率卻只有 12%，另外對於呼應政府推動外貿產業的大企業更是提供只有 6% 的低率貸款。¹⁹最後則是南韓政府以賦稅手段來控制大企業，在 1980 年當南韓重化工業發展受到國際不景氣的影響而逐漸衰微的同時，南韓政府卻是以降低公司稅來幫助大企業脫離經營困境，例如在 1971 年南韓政府降低公司稅的幅度只有 20%，但是到了 1980 年降低幅度卻高達 65%，次年在 1981 年更是高達 80%。²⁰

在南韓軍人政府全力扶植大企業的政策下，南韓大企業逐漸出現了外部產業壟斷與內部股權集中等兩種現象，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大企業對南韓總體產業結構的壟斷程度，舉南韓大企業在 1993 年整體產業結構的集中度為例，當時南韓前三十大企業的資產集中度為 46.5%，雇用員工集中度為 18.5%，銷售集

¹⁷ Jwa, *op.cit.*, p.19.

¹⁸ Jong-chan Rhee, *The State and Industry in South Korea* (NY: Routledge Press, 1994), pp.78-80.

¹⁹ Jwa, *op.cit.*, p.25.

²⁰ Sung-Soon Lee, *Government-Le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olicies: Accomplishment and Problems* (Seoul: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1998), pp.42-44.

中度為 42.5%，而反觀鄰近的日本資產集中度只有為 22.7%，雇用員工集中度也只有 15%，銷售集中度為 25.8%，由此可見，南韓大企業壟斷整體產業結構的程度。²¹接下來我們再來解構南韓大企業的整体獲利率，在軍人政府刻意扶植的大企業，其規模雖然大，但是獲利率卻是不如預期的，根據統計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前，南韓前三十大企業的總體負債比例高達 518.9%，遠高於當年南韓整體製造業的負債比的 396.3%，而在 1994 年時，當年南韓大企業的整体負債率只有 355.7%，與當年南韓製造業整体負債比的 302.5% 相差不遠，由此可見，南韓大企業的規模雖然大，總體營業額也高，但是獲利率卻不高。²²

接下來則是要分析南韓大企業在內部股權的集中化，首先我們先看看南韓大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我們知道一般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可從銀行體系的借貸，也可以從資本市場來募集，而南韓大企業在政府的刻意安排下，大部分卻都是來自於政府所控制的銀行體系，舉例來說，在 1975 年南韓大企業來自銀行體系的資金占其總資金的 23.6%，但是來自資本市場也有 23.1%，但是到了 1985 年，南韓大企業來自銀行體系的資金提高至 35.8%，而來自資本市場的資金卻只有 27.2%，由此可見，南韓大企業對於銀行體系資金的依賴性是越來越高的（請參見表二）。²³另外，在南韓大企業的內部持股方面，在 1987 年南韓前三十大企業的內部交叉持股比例高達 43.6%，而其中家族持股有 15.1%，關係企業持股有 41.1%，到了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前夕，雖然歷經政府的改革，南韓大企業的內部交叉持股仍然高達 27.5%，其中家族持股仍有 8.5%，關係企業持股也有 33.7%，由此可見，南韓大企業的股權大多掌控在內部的關係企業與家族企業當中（請參見表三）。²⁴

由此可見，在朴正熙重化工業的推動之下，雖然促成南韓經濟在 1980 年

²¹ Jwa, *op.cit.*, p.35.

²² “Fair Trade Commission of Korea,” <http://www.ftc.go.kr/eng/>(August 28,2007).

²³ Haggard, Liom, and Kim, *op.cit.*, p.86.

²⁴ “Fair Trade Commission of Korea,” <http://www.ftc.go.kr/eng/>(August 21, 2007).

代的快速成長，但是也間接造成南韓大企業的迅速擴張，大企業在銀行體系提供充足及低廉的資金不虞匱乏的情況下，在海外到處進行無效率的投資，導致南韓大企業規模雖然龐大，但是整體獲利率卻是相當低，此外南韓大企業在擴充的過程當中，不但逐漸壟斷南韓的產業結構，並壓縮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同時南韓大企業內部的股權也逐漸集中在少數家族的手中，形成家族統治企業的特殊現象，這是南韓重化工業在推展過程當中所出現大企業壟斷及集中現象。

在分析 1997 年之前南韓大企業的發展過程之後，接下來將要探討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南韓政府對大企業的結構改革。

表二、南韓大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3
金融體系	19.4	23.6	32.2	35.8	36.5	37.0
銀行體系	14.8	17.2	20.7	19.7	18.7	17.8
非銀行機構	4.6	6.5	11.5	16.0	17.8	19.2
資本市場	37.5	23.1	21.3	27.2	35.9	39.0
公司憑證	0.0	0.6	2.0	2.6	4.8	5.3
公司債	0.3	0.7	3.5	7.2	11.0	13.4
股票市場	37.2	21.7	15.0	16.4	18.3	16.5
國外借款	10.5	15.3	15.0	9.4	5.5	4.1
其他	32.6	37.9	31.4	27.6	22.1	20.0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Haggard, Liom, and Kim, *op.cit.*, p.86.

表三、南韓前三十大企業內部的持股方式

	1987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內部交叉持股	43.6	40.5	32.1	31.8	38.8	28.0	26.8	26.3	24.8	27.5
家族持股	15.1	14.7	13.7	13.9	12.6	10.3	9.7	10.5	10.3	8.5
企業持股	41.1	32.5	31.7	33.0	33.5	33.1	33.1	32.8	33.3	33.7
總計	56.2	47.2	45.4	46.9	46.1	43.4	42.8	43.3	43.6	41.2

資料來源：“Fair Trade Commission of Korea,”<http://www.ftc.go.kr/eng/>(August 21, 2007)

肆、1997 年後南韓政府對大企業的結構改革：從集中到解構

南韓政府在重化工業期間，這種以大企業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確在 1980 年代促進南韓經濟的快速成長，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大企業佔南韓總體經濟產值的比重越來越高，以及大企業內部的股權越來越集中，再加上南韓大企業因為低廉充裕的資金來源，而毫不考慮成本效益的海外投資策略，使得大企業的總體負債比越來越高築，這也充分凸顯出南韓經濟在成長背後的結構脆弱性，南韓這種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在國際經濟景氣熱絡的時候，也許還可以加以掩飾，但是當經濟景氣亮起紅燈的時候，尤其是金融危機發生時，南韓大企業的收支便無法平衡，形成連鎖的倒閉效應，而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便是壓倒南韓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²⁵

1997 年 7 月泰國股匯市場受到國際投機客的襲擊，造成泰銖的急遽貶值，泰國政府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大量投入外匯存底來防守泰銖的底線，但是最終因為外匯存底不足而棄守，泰銖的劇貶造成鄰近東南亞國家貨幣的競相貶值，亞洲金融風暴就此爆發，由於東南亞地區是南韓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因此

²⁵ Donald Kirk, *Korean Crisis: Unraveling of the Miracle in the IMF Er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p.3-16.

當東南亞國家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而進口銳減之後，連帶著就影響到南韓大企業的出口貿易，在外貿市場收益急遽減少的情況下，使得原本負債比率就相當高的南韓大企業一時無法償還國內銀行的貸款，因此就在 1997 年 10 月，南韓第八大企業—起亞集團宣布倒閉重整，同時希望能夠尋求銀行團的資金援助，起亞集團的經營危機連帶造成南韓大企業及銀行連鎖倒閉的效應，使得南韓爆發全面性的金融危機，在國內經濟岌岌可危的情況下，當時南韓金泳三政府便尋求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經濟援助，國際貨幣基金同意對南韓 570 億美元的紓困貸款，但同時也連帶針對南韓的經濟結構提出改革方案，建議從大企業結構的改革來挽救南韓脆弱的經濟體制。²⁶

1998 年 2 月金大中總統在金融危機的動盪下宣布就職，他一方面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的改革方案，另一方面也對南韓的銀行體系、大企業結構及政商關係作全面性的改革，在大企業結構改革方面，金大中為了表示他徹底改造南韓大企業的決心，除了任命索羅斯為南韓非正式經濟顧問之外，也任命反財閥色彩的學界人士為財政經濟院長及金融監督委員會首長，同時宣佈即日起允許外國惡意併購南韓本國企業，並允許大企業進行大規模裁員以降低經營成本，金大中的目的是想要以外國資金來沖淡國內大企業由少數人把持的家族色彩；在另一方面，金大中也對外公佈在 1998 年 5 月底之前關閉所有出現財務問題的企業，同時在記者會上對外公佈南韓 55 家政府認為已經難以存活的企業名單，希望政府當局來加強整頓，在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下，金大中宣佈一系列改革大企業的決心之後，南韓大企業才真正認為金大中是在玩真的，²⁷於是南

²⁶ Stephan Haggard and Jongryn M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orean Financial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7, No.2 (2000), pp.197-218.

²⁷ 國際貨幣基金在 1997 年 12 月正式通過同意給予南韓 570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但是國際貨幣基金卻同時也定下嚴苛的紓困條款，其主要的紓困條件包括緊縮國家財政、低經濟成長率、抑制國內物價上揚、壓縮對外經常帳赤字以及擴大外國人對南韓的經濟投資，我們茲可以將國際貨幣基金對南韓的紓困的條件區分成經濟目標、政府、企業與銀行等四個面向，在經濟目標方面包括總體經濟指標，在政府方面包括貨幣及外匯政策、財政政策、貿易自由化及勞工市場，在企業方面包括大企業集團管理與改革，在銀行方面包括金融改革與金融市場自由化。假若南韓政府未能達到國際貨幣基金所設下的經濟目標，將被要求提前還款。Peter G. Chang, *IMF and*

韓前三十大企業立刻宣佈承諾進行五項結構改革，並將於半年之內具體實施完成。²⁸

具體而論，金大中的大企業改革可以區分成企業結構規模的改革以及企業股權的改革兩個面向：首先是企業結構規模的改革，他將大企業的核心事業做清楚的分野，各大企業首先確立三至五種主力產業，並將旗下平均子公司數從 264 家降至 130 家左右，以避免企業之間重複投資與產業過剩，另外，南韓政府也規定大企業必須將非主力部門及不賺錢的部門加以裁撤，同時過去向銀行聯貸的 20 兆韓圓借貸必須提前償還，以及今後金融機構與大企業之間的借貸與出資之間關係必須要做明確的界定，以避免利益輸送關係。²⁹

在金大中政府的堅持下，由南韓大企業所組成的「全國經濟聯合會」便於 1998 年 9 月宣布「主要企業事業結構調整方案」，將前五大企業旗下所屬的半導體、石油化學、汽車、航太、鐵路車廂製造、發電設備與船舶用引擎、煉油等七項產業進行事業互換（Business Swap）的工作，希望藉由縮減過剩的產能、抑制重複投資及過度競爭，以避免不必要的經濟資源浪費，並促使產業競爭力之提升，進而協助南韓平安渡過此次的金融危機。³⁰

舉例來說，南韓最大的現代集團其主要資金是來自南韓外換銀行，它的子公司原本有 63 家，但是經過金大中的結構改革之後，變成只剩下 32 家，並且只有專攻汽車業及建設業；其次三星集團的主要資金來自韓一銀行，它的子公司原本有 65 家，但是改革之後剩下 40 家，今後並專心經營電子業及金融業務；大宇集團更是明顯，大宇集團的主要資金來自南韓第一銀行，它的子公司原本有 41 家，但是經過結構改革之後，徹底解體變成只剩下 10 家，其今後專心經營重工業；另外 LG 集團也從 53 家裁減為 32 家，專攻家電業；最後 SK 集團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River Edge, N.J.: World Scientific, 1998)；白井早由里，《檢證 IMF 經濟政策：東アジア危機》（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99）。

²⁸ Jwa, *op.cit.*, pp.38-44.

²⁹ Jin-Wook Choi, "Regulatory forbearance and Financial Crisis in South Korea," *Asian Survey*, Vol.37, No.2 (2002), pp.255-258.

³⁰ 高龍秀，前揭書，頁 158-159。

從 49 家縮減為 22 家，專攻化學產業。³¹（請參見表四）

接下來則是要對企業股權的結構作改革，以確立大企業經營的透明化，南韓政府規定今後各大企業以家族理事會為中心的經營體制必須要做改變，並將公司的經營權交由專業經理人來營運，同時企業會計年度的報表，也必須要各大企業之間相互公開連結，另外，則是過去由大企業之間向銀行相互貸款保證的慣例，今後也將徹底取消，例如南韓政府便決定取消銀行體系剛通過的大企業之間相互保證貸款 12 兆 7000 億韓圓。³²

在金大中政府的堅持下，南韓大企業改變過去的所有權（ownership）結構，並採取西方式的企業專業經理人管理方式，以避免像過去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均是由特定家族所壟斷，同時也對大企業的治理方式進行改革，以避免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利益輸送關係，或是大企業以政治獻金向政府官員關說的弊病。最後則是南韓政府則是提供減稅優惠（tax advantage）給大企業，和其他大企業交換過來的子公司，以避免大企業不斷擴張經營非自己專門的子公司，同時也迫使大企業經營其專門的企業，這樣或許可以大幅改善企業經營不良的狀況，並且避免因為子公司經營不善，反而拖垮原來的母體企業。³³

以南韓產業結構的改變為例，在半導體產業方面，原本有三星電子公司、現代電子工業及 LG 半導體，但是經過金大中的結構改革之後，只剩下三星電子公司一家；在石化工業方面，原本有三星石化公司、現代石化公司、漢華石化公司及大林石化公司等四家，但是經過改革之後，只剩下現代石化公司及漢華石化公司兩家；在原本虧損最嚴重的航空業方面，之前有三星航空工業、大宇航空工業及現代飛機製造所，但是南韓政府徹底將其解體，並引進外資重新加以改造；在汽車產業方面，原本有現代汽車公司、起亞汽車公司、大宇汽車公司及三星汽車公司，南韓政府將經營不善的三星汽車併購給法國雷諾公司，

³¹ 同前註，頁 146。

³² Young Shim, *Korean 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Crisis and Reform*,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ress, 2000), pp.5-8.

³³ Heo Uk and Sunwoong Kim, "Financial Crisis in South Korea: Failure of the 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 Paradigm," *Asian Survey*, Vol.40, No.3 (2000), pp.501-506.

大宇汽車併購給被美國福特公司，現在只剩下現代汽車及起亞汽車兩家公司。³⁴（請參見表五）

在家族企業改革方面，以現代集團為例，現代集團在 1997 年之後也紛紛進行股權轉移，本文以 1998 年之後鄭周永家族在現代集團持股比例的轉變為例，鄭周永次男鄭夢九在 1998 年之後對於現代自動車的股權，便從 4%減少成 3.76%，仁川製鐵的股權從 12.1%變成 7.8%，現代精工股權從 4.9%變成 1.1%，最後高麗產業開發股權從 17.9%減少成 5.4%；五男鄭夢憲對現代建設持股從 5.87%減少為 2.41%，對現代商船股權從 16.8%減少成 3.6%，現代電子股權從 14.1%減少為 3.5%，最後現代重工股權從 22.4%變為 9.42%。³⁵總合來說，在持股減少的情況下，鄭周永家族對現代集團的控制能力便逐漸減弱了。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經過金大中的結構改革之後，在外部的結構方面，南韓的大企業逐漸裁減經營不善及虧損連連的產業，由過去的全方位的產業經營型態，轉變為專業性的經營型態；在內部的結構方面，南韓的大家族逐漸退出對大企業的決策圈，並也逐漸降低對大企業的股權持有，由過去的家庭色彩濃厚的企業型態轉變為專業經理人的企業經營型態，這是歷經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南韓大企業最重要的兩項轉變。下一節便是要分析南韓大企業的這兩項轉變，對於南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會產生何種的質變。

表四、南韓五大企業的結構改革

大企業	主要資金銀行	企業子公司	改革後主力產業
現代集團	外換銀行	63—32	汽車業、建設業
三星集團	韓一銀行	65—40	電子業、金融業
大宇集團	第一銀行	41—10	重工業、貿易業
LG 集團	商業銀行	53—32	家電業、通訊業
SK 集團	第一銀行	49--22	化學業、物流業

資料來源：高龍秀，前揭書，頁 146。

³⁴ Jwa, *op.cit.*, p.85.

³⁵ 韓國證券期貨交易所，〈持分公示〉，<http://www.eds.kse.or.kr>（2007 年 9 月 2 日）。

表五、南韓大企業產業項目的結構改革

產業項目	改革前的產業項目	改革後的產業項目
半導體	三星電子公司 現代電子工業 LG 半導體	三星電子公司 ●現代電子工業與 LG 半導體合併進入三星電子公司
石化工業	三星石化公司 現代石化公司 漢華石化公司 大林石化公司	現代石化公司 漢華石化公司 ●現代石化公司併購三星石化公司 ●漢華石化公司併購大林石化公司
航空業	三星航空工業 大宇航空工業 現代飛機製造所	引進外資併購三星航空工業、大宇航空工業及現代飛機製造所
重工業	現代重工公司 大宇重工公司 漢津重工公司	漢津重工公司 ● 漢津重工併購現代重工與大宇重工
營造業	韓國營造公司 三星營造公司 現代營造公司	韓國營造公司 ●韓國營造公司合併三星營造公司及現代營造公司
造船業	三星造船公司 現代造船公司 漢忠造船公司	漢忠造船公司 ●漢忠造船公司併購三星造船公司及三星造船公司
煉油業	漢華能源煉油公司	現代石化公司 ●漢華能源煉油公司被現代石化公司併購
汽車業	現代汽車公司 起亞汽車公司 大宇汽車公司 三星汽車公司	現代汽車公司 起亞汽車公司 ●三星汽車被法國雷諾併購 ●大宇汽車被美國福特併購

資料來源： Jwa, *op.cit.*, p.85.

伍、結構改革後政府與大企業間關係的轉變

從第二節理論的探討以及第三節南韓在戰後政經體制的發展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知道在過去南韓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在外部環境方面，南韓政府不但管制中小企業的發展，以營造一個適合大企業發展的經濟環境，同時它也全力發展重化工業政策，以產業政策來配合大企業的持續擴張；在內部環境方面，南韓大企業從政府控制的銀行體系當中，可以獲得鉅額低廉的資金來進行全方位的投資與擴張，同時又利用家族持股及關係企業的相互持股來鞏固企業經營權。³⁶

但是從第四節當中，我們也知道 1997 年之後金大中對大企業的結構改革也是由政府所主導，南韓政府仍然用管制政策來斬斷大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借貸關係，同時也利用強制的手段來要求大企業進行結構縮減及產業經營的分野。由此可見，在 1997 年之後南韓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外部環境關係並沒有產生改變，但是大企業的內部環境卻在政府的改革之下出現巨大的轉變，因此這是一個由政府所主導的結構改革。以下便是要分析這種政府主導的結構改革會如何改變南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³⁷

在第二節理論探討當中，我們知道南韓政府與大企業在內部環境當中的互動關係包括金融體系與經營方式兩項因素，首先金融體系方面，歷經 1997 年金大中結構改革之後，南韓金融體系出現最大的改變便是金融體系的超政治化，在過去南韓官治金融體系之下，銀行體系背負著提供特定企業融資的重大責任，而大企業也在取得資金容易同時代價低廉的情況之下，進行盲目及無效率的投資，而這也使得南韓在 1997 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讓銀行體系背負巨

³⁶ 姜英之，《韓國經濟挫折と再挑戰：漢江の奇蹟は二度起こるか》（東京：社會評論社，2001）頁 24-28。

³⁷ 高安雄一，《韓國の構造改革》（東京：NTT 出版社，2005），頁 6-10。

額的不良債權。³⁸1998 年金大中就任之後，其首要政策便是要降低銀行體系的壞帳比例，他的具體措施便是要銀行不能以不動產資產來抵帳，以讓存活無望的金融機構退出市場機制；在另一方面，則是對銀行體系實施改組整併，引進體質好的外國銀行來併購壞帳比例高的本國銀行，並適時注入政府的公共資金，來建立一個健全及高效率的金融體制，同時也使得體質好的銀行能夠在自由市場的競爭體制下存活下去。³⁹

其次在經營方式方面，1997 年之後南韓最大的轉變是家族退出企業的經營，在過去由於長期軍人政府的威權統治，使得南韓大企業能夠在政府的包庇之下迅速擴張規模，這些大企業負責人為了避免外部股東佔有太多股權，便實施家族式的經營方式，讓南韓大企業的財務狀況顯得相當不透明化。⁴⁰1997 年之後在金大中政府極力的改革之下，南韓財閥的事業版圖出現相當大的轉變，金大中總統擬定了「出資總額限制」的方式，來避免過去家族式企業的經營弊端，在這項法規中規定：一個家族在同一集團的子公司之間的相互持股，不得超過本公司資產額淨值得 25%，假若有超過的部分，則母公司將不得對子公司經營權擁有表決權，同時南韓政府也積極推動企業財務透明化政策，讓大企業能夠步向正常經營，以及專業經理人模式，讓大企業能夠追求高效率及利潤取向的經營模式。⁴¹

接下來以表六為例，來比較金大中結構改革前後南韓大企業的結構轉變，首先在結構改革之前，南韓大企業的股權幾乎是集中在少數家族手中，同時也是屬於個人支配的構造型態，所有權與經營權都是屬於同一家族所有，例如大宇集團的金宇中家族，以及現代集團的鄭周永家族，在過去軍人政府的刻意保

³⁸ Heather Smith, *Industry Policy in Taiwan and Korea in the 1980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0), pp.2-8.

³⁹ Xiaoke Zhang,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inance in Korea and Thailand: From Deregulation to Debacl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100-103.

⁴⁰ Ha-Joon Chang, "The Hazard of Moral Hazard: Untangling the Asian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Vol.28, No.4(2000), pp.775-788.

⁴¹ Stephan Haggar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pp.83-86.

護及銀行資金的挹注之下，家族企業從短期之內快速擴張，在政府與大企業關係密切之下，政府的監督能力與取締能力都顯得相當薄弱。⁴²但是在 1997 年金大中的結構改革之後，南韓大企業的股權逐漸分散，經營權交由專業的經理人讓家族色彩漸漸淡去，同時南韓政府也引進外國資金重新改造銀行體系，讓大企業想要從銀行體系當中獲得低廉的資金已經是越來越困難了，同時南韓政府嚴格管制政府與企業之間不當政商關係下的利益輸送，這些措施大大增強南韓政府對大企業的監督與取締能力。⁴³

而當政府管制與監督能力增強之後，對南韓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關係會產生何種質變呢？首先是大企業經營業務的減少，過去南韓大企業的所經營產業幾乎無所不包，但是現在南韓政府嚴格限制企業只能發展的特定的專門產業，這項措施讓政府對於大企業的特許執照減少了，也讓南韓政府不再像過去以特許權及市場保護政策來介入大企業的經營權，或是從中獲取不當的政治獻金。

其次是大企業資金來源的多樣化，在過去南韓政府的刻意限制下，大企業的資金大多來自於銀行體系，政府也常常利用銀行利率的高低來控制企業產業的發展方向，但是在 1997 年的結構改革之後，大企業的資金來源不再單從銀行體系去獲取，它也可以到資本市場去發行公司債來募集資金，這項措施讓南韓政府對於大企業的控制力逐漸降低。⁴⁴

第三則是大企業家族色彩的降低，在過去南韓政府刻意扶植與其關係密切的特定家族，來經營政府特許的產業以快速拓展企業規模，這些家族也利用與政府的特殊關係來取得重大的公共建設工程，這讓南韓政治人物與大企業之間的政商關係相當密切，這從金泳三上之後清算盧泰愚與全斗煥，就可以知道南韓政府官員與大企業之間利益輸送關係的嚴重性，但是在歷經結構改革之後，這些家族逐漸從企業經營圈淡去，也讓南韓領導者與大企業之間的政商關係漸

⁴² Juyeong Joanne Cho,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roubled Chaebol Refo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arriot Wardman Park, Washington, D.C., August 31-September 3, 2000.

⁴³ 佐桑徹，《韓國財閥解体》（東京：日刊工業新聞社，2001年），頁44-46。

⁴⁴ 高龍秀，前揭書，頁104-105。

漸變得疏遠了。⁴⁵

最後則是大企業股權的分散，在過去南韓大企業常常透過與旗下子公司之間的交叉持股，來掩飾企業本身鉅額的不良債權，同時也進一步鞏固母公司在各項產業的經營權，但是在經過結構改革之後，南韓政府嚴格限制企業之間的交叉持股，尤其是在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交叉持股更是嚴厲禁止，這像政策大大增強政府對於大企業的監督能力，以避免發生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南韓大企業的連鎖倒閉效應。⁴⁶（請參見圖二）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歷經金大中的結構改革之後，南韓政府的主導能力由過去由政府介入轉變成為政府管制，由控制能力轉變為監督能力，這種政府與大企業關係的轉變，不但有效降低南韓政商勾結的比例，同時也增強南韓政府對於大企業的監督能力，因此這項結構改革完全是由政府所主導的改革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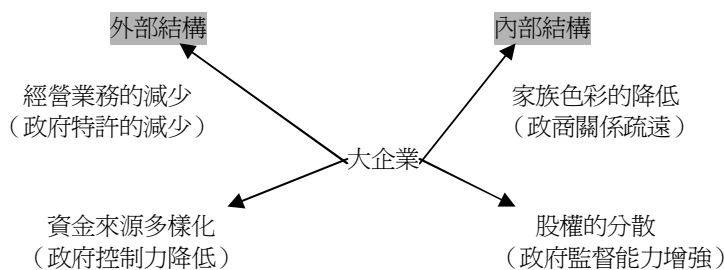
⁴⁵ 高安雄一，前揭書。

⁴⁶ Haggard, Liom and Kim, *op.cit.*, pp.5-8.

表六、比較結構改革前後南韓大企業的結構轉變

改革項目	結構改革前	結構改革後
股權分佈	集中在少數	股權分散
構造型態	個人支配	集體支配
所有權與經營權	家族經營	經理人經營
監督體系	弱	強
取締機能	弱	強
金融特性	政府控制銀行	外資控制銀行
銀行企業關係	企業部分經營	企業禁止經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二、結構改變之後南韓政府與企業的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陸、結論

從以上五節的分析，我們知道南韓的經濟能夠重新起飛，金大中在 1997 年之後所實施的結構改革功不可沒，⁴⁷同時從這些結構改革的項目當中，我們也可以得到以下四點結論：

⁴⁷ 深川由起子，《韓國のしくみ：構造改革を成功させた国のことがわかる》（東京：中經出版社，2002）；高安雄一，前掲書。

首先，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之所以侵襲南韓，其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於大企業的結構性因素，過去南韓政府在推動大企業的政策下，以政府所掌控的銀行體系便提供大企業鉅額的資金，在資金來源不虞匱乏的情況下，讓大企業進行許多無經濟效益的海外投資；另外由於大企業的發展需要龐大的資金，於是由政府所控制的銀行體系便成為大企業資金的主要來源，這種不計成本效益的政策考量，讓銀行體系累積鉅額不良債權；最後由於過去南韓政府對大企業特地量身定做的發展政策，以及過度的偏好性放款，讓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官商勾結及利益輸送關係越來越嚴重。

其次，在 1997 年之後南韓在經過金大中的結構改革之後，不論在內部或是外部結構都產生相當大的轉變，在外部的結構方面，南韓的大企業逐漸裁減經營不善及虧損連連的產業，由過去的全方位的產業經營型態，轉變成專業性的經營型態；在內部的結構方面，南韓的大家族也逐漸退出對於企業的決策圈，並且逐漸降低對大企業的持股比例，讓南韓大企業由過去的家族色彩企業轉變成專業經理人的企業經營型態，因此金大中政府對大企業的結構改革是南韓經濟能夠再度起飛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金大中對大企業的改革是一項由政府所主導的結構改革，這項結構改革政策在 1997 年之後，雖然讓南韓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外部環境關係，並沒有產生絕對性的改變，換句話說，也就是南韓政府對於企業的管制能力及產業政策仍然奏效，但是大企業的內部環境，卻在政府的改革之下出現巨大的轉變，因為南韓的金融體系的放款政策已經逐漸超政治化，而且南韓的財閥家族也逐漸退出企業的經營圈。

最後是南韓政府對企業的主導能力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出現巨大的轉變，其是由過去由政府介入轉變成為政府管制，同時也由過去的控制能力轉變為監督能力，這種政府與大企業互動關係的轉變，不但有效降低南韓政商勾結的利益輸送關係，同時也增強南韓政府對於大企業的監督能力，讓南韓經濟避免再重蹈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大企業連鎖倒閉的效應。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南韓之所以能夠從金融危機當中走出，主要是來自於金大中政府堅定的改革政策，積極去破除過去的軍人政府所編織綿密的政商關係，另外南韓經濟在 2000 年之後之所以能夠快速成長，主要來自於南韓企業轉型政策的成功，金大中政府將南韓大企業從過去的代工層次提升至研發層次。南韓在國際市場上一直是我國最大的競爭對手，當南韓企業挾著優勢品牌及研發能力陸續攻佔東南亞、印度及中亞等新興市場，我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應該是要如何進行產業升級結構改革及輔導企業轉型，從目前以代工為主導轉變為強化研發及自我品牌來創造我國的第二次經濟奇蹟。

參考文獻

一、報紙報導與專文

〈亞洲金融風暴與南韓經濟發展〉。《國際經濟情勢週報》，1997 年 12 月 25 日，第 1216 期。

李雪莉。2004 年。〈韓國有夢，所以躍升〉。《天下》，2004 年 12 月 15 日，第 313 期。

《中國時報》。2006 年 11 月 16 日，第 A3 版。

二、網站資料

Fair Trade Commission of Korea. <http://www.ftc.go.kr/eng/>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http://www.eiu.com/index.asp>

韓國證券期貨交易所。 <http://www.eds.kse.or.kr/index.html>

三、日文書目

高安雄一。2005 年。《韓國の構造改革》。東京：NTT 出版社。

高龍秀。2000 年。《韓國の經濟システム：國際資本移動の擴大と構造改革の進展》。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佐桑徹。2001 年。《韓國財閥解体》。東京：日刊工業新聞社。

深川由起子。2002 年。《韓國のしくみ：構造改革を成功させた国のことがわかる》。東京：中經出版社。

白井早由里。1999 年。《檢證 IMF 經濟政策：東アジア危機》。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姜英之。2001 年。《韓國經濟挫折と再挑戰：漢江の奇蹟は二度起こるか》。東京：社會評論社。

四、英文期刊：

Chang, Ha-Joon. "The Hazard of Moral Hazard: Untangling the Asian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Vol.28, No.4(2000), pp.775-788.

Cho, Juyeong Joann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roubled Chaebol Refo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arriot Wardman Park, Washington, D.C., August 31-September 3, 2000.

Choi, Jin-Wook. "Regulatory forbearance and Financial Crisis in South Korea."

Asian Survey, Vol.37, No.2(2002), pp.255-258.

Haggard, Stephan, and Jongryn M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orean Financial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7, No.2(2000), pp.197-218.

Kuk, Minho. "The Government Role in the Making of Chaebol i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 *Asian Perspective*, Vol.12, No.1(1988).

Uk, Heo, and Sunwoong Kim. "Financial Crisis in South Korea: Failure of the 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 Paradigm." *Asian Survey*, Vol.40, No.3(2000), pp.501-506.

五、英文書目

Amsdem, Alice. *Asia's Next Giant: The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oki, Masahiko, Hyung-Ki Kim, and Masahiro Okuno-Fujiwara, ed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Chang, Peter G. *IMF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River Edge, N.J. : World Scientific, 1998.

Gereffi, Gary and Donald L. Wyman, eds.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New Jersey: Princeton

- University Press, 1990.
- Choi, Jin-Wook. "Regulatory forbearance and Financial Crisis in South Korea." *Asian Survey*, Vol.37, No.2(2002), pp.255-258.
- Diamond, Larry and Byung-Kook Kim, eds.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South Kore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 _____ and Doh Chull Shin, eds.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e Press, 2000.
- Field, Karl. *Enterprise and the State in Korea and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Gereffi, Gary, Donald L. Wyman.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Haggard, Stephan, Chung H. Lee, and Sylvia Maxfield.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_____.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 _____, et. al.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Adjustment in Korea, 1970-199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_____, Sylvia Maxfield, and Ben Ross Schneider, eds.,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_____.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 _____, Wonhyuk Liom, and Euysung Kim. *Economic Crisis 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Korea: Reforming the Chaebo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mith, Heather. *Industry Policy in Taiwan and Korea in the 1980s*. Cheltenham,

- UK: Edward Elgar, 2000.
- Jones, Leroy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orean Ca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Jwa, Sung-Hee. *The Evolution of Large Corporations in Korea: A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of the Chaebol*.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2.
- _____. *A New Paradigm for Ko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Government Control to Market Economy*. London: Palgrave, 2001.
- Kang, David.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Kirk, Donald. *Korean Crisis: Unraveling of the Miracle in the IMF Er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 Lee, Sung-Soon, *Government-Le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olicies: Accomplishment and Problems* (Seoul: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1998).
- Maxfield, Sylvia. *Govern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Mexico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aulette, Kurzer. *Business and Banking: Polit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hee, Jong-chan. *The State and Industry in South Korea*. NY: Routledge Press, 1994.
- Shim, Young. *Korean 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Crisis and Reform*.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ress, 2000.
- Woo, Jung-en. *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the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Zhang, Xiaoke.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inance in Korea and Thailand: From Deregulation to Debacl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Zysman, John.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